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两大奇迹”的制度解码

□ 许宝健 石伟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更深层次上看，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绝不是随随便便能得来的，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制度背景和制度依据。归结起来，“两大奇迹”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奇迹，是基于对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国际比较作出的重大判断；“两大奇迹”之所以能够被创造出来，是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显著优势充分发挥的必然结果；“两大奇迹”之所以能够继续葆有光明前景，是我们党坚定制度自信，不断推动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应有之义。

深刻认识作出“两大奇迹”这个重大判断的基本依据

奇迹，是指极难做到的、不同寻常的事情。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带领人民不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取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成就，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70年来的伟大成就概括为“两大奇迹”，即“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两大奇迹”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奇迹，是基于对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国际比较作出的重大判断。

从纵向的历史比较看，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社会实现了长期稳定。一方面，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和发展。1952年至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679.1亿元跃升至90.03万亿元，实际增长174

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19元提高到6.46万元，实际增长70倍。2018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13.2万公里，比1949年增长5倍；公路里程达485万公里，比1949年增长59倍；能源生产总量达37.7亿吨标准煤，比1949年增长157.8倍。这一组组数字雄辩地证明，我国经济总量大幅跃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斐然，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呈现新格局，对外开放成效突出，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变成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另一方面，我国持续保持了国家政治和社会大局稳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既经历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变迁，也经受了不少重大考验，比如抗美援朝战争、三年困难时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特大洪灾、2003年非典重大疫情、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和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考验。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奋斗，我们党和国家不但胜利渡过了一系列难关，而且有力巩固了人民政权、持续保持了国家政治和社会大局稳定，并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一系列重大成就。

从横向的国际比较看，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产生了极为鲜明的对比。一方面，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目前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并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和来源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18%左右，近几年来高达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就令世界上不少国家羡慕。另一方面，同世界上一些国家频现政治动荡、政权更迭、社会分裂、暴力蔓延、枪击不断等现象不同，中国这边风景独好，社会大局保持长期稳定，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到处呈现一派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的景象。从世界范围来看，一个

国家和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保持稳定并不少见，但像中国这样在长时间跨度内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保持稳定的情况则世所罕见。

深入把握创造“两大奇迹”的制度必然

必然性是指在事物发展中一定如此的趋势，是由事物内部的根本矛盾决定的，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作用。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创造，原因是多方面的，条件也是多方面的。但从更深层次来讲，“两大奇迹”的创造，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更是一种制度的必然。

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问题。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层面的要素是最根本的。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在某种意义上讲，唯有具备制度优势，一个国家才可能确保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因此，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两大奇迹”的创造，归根结底是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的结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90多年的伟大社会革命、进行70年的新中国建设、进行40多

年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14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所具有的显著优势归纳为“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等13个方面。这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展开，是“中国之治”制度密码所在，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也正是由于具备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创造才是一种必然。

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党的十八大后我考察调研的第一站就是深圳，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再来这里，就是要向世界宣示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中国一定会有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在改革开放40多年历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

开放的新局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336项重大改革举措。经过五年多的努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成效显著，主要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同时，必须要看到，这些改革举措有的尚未完成，有的甚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落实。我们已经啃下了不少硬骨头，但还有许多硬骨头要啃；我们攻克了不少难关，但还有许多难关要攻克。因此我们决不能停下脚步，决不能有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断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

相比过去，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深刻把握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提出了13个方面的重要任务。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创新，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1949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时毛泽东同志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香山革命纪念馆时指出：“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中国共产党是勇于创造奇迹的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一定会不断创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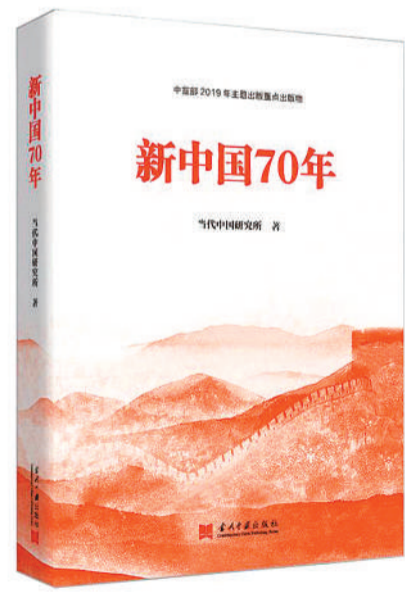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厚植历史根基 滋养中国气派的经济史学

——参加编写《新中国70年》的几点体会

□ 武力 李扬

新书印象



工业化进程，从而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巩固了国防安全，推动各项事业全面起步，使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实现了“站起来”。改革篇讲述了新中国如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破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调动各种积极性，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增长的奇迹，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整体上实现了“富起来”。强国篇讲述了新中国如何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以供给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阅读《新中国70年》，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而且可以看到这些成就背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何引领中国经济一次又一次闯过激流险滩，又是如何在探索中不断自我扬弃、自我完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毫不动摇地坚持基本制度，又与时俱进地突破旧有教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新中国70年》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演变历程，有助于我们更加明确：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当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从而既坚持“四个自信”，又不墨守成规，真正做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同时，《新中国70年》也有助于更准确地认识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类问题的性质。新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发展非常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大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就必然要在这期间里集中面对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等问题。然而，这些集中发生的问题却各自具有不同的性质：有的问题是特有的，像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些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如城乡二元经济问题；有些问题则是各国普遍性的，如收入分配差距。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有的问题是中短期性质的，如绝对贫困；有的问题则是长期性质的，如资源短缺、环境保护。而所有问题，几乎都可溯流而上，在历史中找到其源头。《新中国70年》恰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些问题的出处，纵览全书，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正在攻坚的问题、随时代新生的问题。而历史地

看待各类问题，则有助于针对其不同性质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案，统筹制定政策体系，既坚定久久为功、打持久战的战略定力，又增强当机立断、打歼灭战的改革魄力。

从全局高度深刻把握经济问题

《新中国70年》全景记录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外交、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各项事业。其中，经济建设作为主线，与各项事业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在书中得到了清晰呈现。

探索篇介绍了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为保证国防安全和加快生产力发展，而确立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并为此实行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保证了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为适应上述生产方式的变化，在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也进行了一系列变革，上述工业化战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变革，尽管有不少失误和发展曲折，但是解决了国家安全问题，同时也为各领域的全面进步和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基础。改革篇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之后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在改革开放的探索中明确了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确立起“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而推动经济建设一马当先，各项事业万马奔腾，综合国力蒸蒸日上。强国篇介绍了新中国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包括经济建设在内的各项事业的历史性突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历史征程。

《新中国70年》将经济建设置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全局中予以记录，对于我们当下的经济研究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一方面，全面了解新中国史可以避免认识的孤立性和片面性。经济研究有时容易出现抛开政治、文化、社会等非经济因素，就经济谈经济的倾向，因此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由此得出的结论往往偏离事实。例如，若仅从经济学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似乎应该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但只有综合考虑当时的国防、外交等客观条件之后，才能真正理解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意义。再如，对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研究，若仅从经济学理

性人的假设出发，则容易认为该体制效率低下；但当时全国人民众志成城、一心为公的集体主义价值追求，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制度运行的道德风险，使得新中国得以有效利用这一制度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可见，只有全面地了解历史，才能更准确地理解经济。

另一方面，全面了解新中国史有助于更科学地制定经济政策。在过去的实践中，我们既出现过偏离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的失误，也出现过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问题。只有把经济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中予以考虑，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经济建设作为党的工作中心的重要地位，也才能全面认识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科学制定经济政策。同时通过学习历史，也能够使我们更好地运用发展的、辩证的眼光观察问题，尤其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向往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的美好生活，世界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建设更需统筹兼顾，与其他各领域相辅相成。系统学习新中国史，无疑有助于培养这种统筹兼顾的能力。

从中国国情出发科学构建经济理论

产生于西方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发展而逐渐成熟起来的现代经济学，如果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开端，已经240多年了，应该说发展至今，已经可以比较好地解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被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学界所接受，也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用来认识和分析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和方法。

但是，这个产生和成熟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却不能很好地解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如何在国际经济学界确立我们的话语体系，为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就成为有待解决的问题，以至于产生这样一种奇特景象：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发展最快、最活跃的经济体，保持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但是对其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对其政府与市场关系，却缺乏为世界所普遍接受的经济解释。这无论对于中国经济实践，还是对于经济学理论研究，都是一种缺憾。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脱节的现象，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去甚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

在经济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政府的作用相对较小；而企业的行为与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为接近，所以基于理性人假设所构建的经济学模型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较为相似，解释力也相应较强。即使如此，经济学理论还是无法完全解释所有经济现象，在预测和指导实践方面更是捉襟见肘。

新中国自诞生之日起，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施赶超型发展战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有为的政府、规模庞大的公有制经济等因素大大加快了赶超的速度，也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石。但这一制度目前还无法完全抽象成理论模型。这就导致西方经济理论只能少部分解释中国经济问题，遑论预测未来和指导实践。

新中国的历史证明，许多西方经济理论所无法模拟的“非经济因素”，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也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制度。毋庸讳言，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仍然需要完善，例如，如何使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相得益彰，如何科学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如何兼顾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等问题，都需要更加深入地探索。但是，深化改革不能放弃制度优势而一味追求与理论模型相契合，那无异于削足适履；而是应当使理论构建符合我们在成功实践中总结的基本经验。

这就意味着，要构建富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经济史学理论，首先要深入了解中国经济史。而经济作为各项事业中的一项，又必须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中去理解。因此，系统学习新中国史就应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条件。正如恩格斯评价马克思时所说：“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而实际上马克思的研究从来不限于经济史，而是整个人类的全部历史。经济学在诞生之初即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研究视野本就包罗万象，尤其重视历史研究，只是在后来的演变中才部分走上了公式化的套路。如今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应回归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向历史汲取养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70年》对经济学理论研究亦当有所裨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不忘历史、不忘初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者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而加强新中国史学习，必将为经济工作提供深厚的滋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版编辑 赵登华